

清朝柔远记

(清) 王之春撰

中华书局

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清朝柔遠記

〔清〕王之春 撰

趙春晨 點校

中華書局

清朝柔遠記

〔清〕王之春 撰

趙春晨 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懷柔茶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7¹/₂ 印張·341 千字

1989 年 6 月第 1 版 198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300 冊 定價: 7.65 元

ISBN 7-101-00027-4/K·13

前 言

明代中葉(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之後，東西海道大通，西方國家爲尋求商品市場和殖民地的需要，紛紛航海而來，中西間交往日益頻繁。進入清代(十七世紀中葉以後)，這種頻繁交往的局面繼續發展。到清道光年間(一八四〇年)，更爆發了鴉片戰爭，以英國爲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悍然用武力打開中國的門戶，使中國一步步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之間的矛盾，成爲近代中國社會的兩大主要矛盾之一。因此，清代的中外關係，不僅在規模上大大超過了前代，其重要性也遠非歷朝所可比擬。適應這種情況，清人(特別是清末)有關中外關係的記述和論著之多也是空前的。其中王之春的《清朝柔遠記》(原名《國朝柔遠記》，亦稱《國朝通商始末記》或《中外通商始末記》)比較全面地記述了光緒以前清代的中外關係，特別是歐洲列強的侵華活動，就是這類著作中影響較大的一種。現將王之春的生平和《清朝柔遠記》一書內容簡單介紹如下。

王之春字爵棠，又作芍棠，湖南清泉(今衡陽)人，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生，卒年不詳。他是明末清初著名思

想家王夫之的後裔，“少爲名諸生”（李元度：《椒生詩草》序），青年時期投身幕府，曾追隨曾國藩、李鴻章等人鎮壓農民起義，轉戰華北、西北數省，以“文人兼武事”的“才幹”受到湘淮大吏的賞識和任用。

同末光初（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之際，王之春先後作爲李鴻章和彭玉麟的部屬率軍駐防於北塘海口和江蘇鎮江（京口）一帶。這時正是外國資本主義加緊侵華，引起我國邊疆發生普遍危機的時刻，日益嚴重的民族災難促使越來越多的愛國之士睜眼看世界，向西方探求新知，尋找自強禦侮的道路，王之春也是其中的一員。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日軍侵臺事件發生，更使王之春深受刺激。他在當時所作的一首詩裏寫道：“事兼中外費調停，失險先如戶不扃。棘手多時夷性狡，填膺有憾海風腥。兵端已啟防乘間，船政頻修想發硎。一紙新聞傳滬上，好音側耳可常聽。”（《椒生詩草》卷三）爲了總結鴉片戰爭的經驗教訓，王之春根據當時民間流傳的無名氏抄本《英夷入寇記》（實係魏源所著，由於政治原因一直不曾署名刊印，至光緒四年方以《道光洋艘征撫記》一名刊入魏源《聖武記》書中）改編點定，刊印了《防海紀略》一書。此書雖非王之春本人所著，但經他改編刊印，有利於這部愛國主義信史的流傳，對當時和以後的思想界起了積極的作用，其功自不可沒。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左右，王之春又編成《清朝柔遠記》一書的初稿，記述清代自開國以來二百餘年間中外交涉的歷史，介紹世界各地的概況，闡述自己的洋務思想和主張。書成之後，頗受洋務派人士的重視，雖未付印，而“索閱者多，苦不暇給”（《清朝柔遠記》自序），“談時務者奉爲圭臬”（李元度：《椒

生詩草》序)。

光緒五年冬，中俄伊犁交涉吃緊，日本又乘機在這一年正式宣佈吞併琉球，威脅我國的東部海疆。爲了掌握日本的動向，南洋大臣、兩江總督沈葆楨決定派人赴日查探，一向留心中外交涉事務的王之春成爲合適的人選。他此行往返三十餘日，游歷長崎、橫濱等地，多有所得。歸國後，他曾親赴北京，向朝廷“上萬言書，陳夷務，自請率銳師規復中山”（李元度：《椒生詩草》序）。雖未被採納，却足以看出他當時的愛國激情。他又將這次日本之行的見聞和所得編寫成冊，以《談瀛錄》之名於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刊刻出版。彭玉麟在給該書所寫的序言中贊譽它“言簡而義賅，俾日國情形一翻閱而瞭如指掌”，“誠防日以防俄之秘鑰，亦服日以服俄之韜鈴也”（《談瀛錄》序）。

中法戰爭前後，王之春奉調赴粵，先後擔任雷瓊兵備道、高廉兵備道等職，並參加了中法雙方勘議中越界址的工作。據樊恭煦在《清朝柔遠記》跋語中講，王之春在這次勘界交涉中，表現得頗爲出色，“堅持舊址，據證明確，詰折夷使不少假借”，得到朝廷使臣的信賴。不久，他便升任爲廣東按察使，並署理廣東布政使的職務。

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在署理廣東布政使任內，王之春曾接待過東游來華的俄國沙皇世子尼古拉二世。因爲有這種關係，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他以頭品頂戴湖北布政使的身份奉派出使俄國，弔唁俄皇亞歷山大二世逝世，並恭賀新皇尼古拉二世嗣位。當時正值中日甲午戰爭，王之春此行似有“借俄之力以制倭人”的政治意圖。但是未等他從俄國出使歸來。

馬關條約業已簽訂。王之春使俄的政治意圖雖未能完全實現，而他却得以游歷英、法、德、俄諸國，“周閱工廠，訪其政制，察其異同”，增長了不少新知。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回國後，他向朝廷上自強新政八條，主張修鐵路、重商工、開礦務、變通科舉等。這次王之春出使俄國的行程日記，也於同年刊刻行世，即所謂《使俄草》八卷。

王之春在洋務運動期間雖不失為一個有一定愛國心、追求新知的開明官吏，然而他的思想却始終不曾跳出封建主義體系的窠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社會急劇地向前變化，王之春却只能充當清王朝死心塌地的走卒，越來越落伍於時代了。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他在四川布政使任內鎮壓了余棟臣起義，因此被升任為山西巡撫（後調安徽）。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他又被派往廣西，以鎮壓正在烽火四起的廣西農民大起義。在廣西巡撫任內，傳聞王之春主張以出讓廣西鐵路和礦產權利為條件，“借法兵法款，以平內亂”（《辛亥革命》第一冊第四八九頁），從而激起國內民衆的“抗法”運動。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春，上海等地愛國人士和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紛紛召開“抗法”大會，通電清政府，要求罷免王之春的職務。在全國民衆的憤怒呼聲中，王之春於當年閏五月被革職。清廷並否認政府與聞借法人之事，“抗法”運動方告平息。

王之春在政治舞臺上的最後一幕，是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在上海發生的轟動一時的“刺王”事件。當時正值日俄戰爭，王之春以卸職巡撫的身份居上海，倡“聯俄拒日”之議，“日日會晤俄兵官、俄領事”（《警鐘日報》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三

日)，引起愛國人士的憤恨。當年十一月十九日，萬福華在上海英租界四馬路一枝春番菜館持槍行刺王之春，事未遂而萬被捕，受牽連入獄者還有黃興、章士釗等十餘人。此後，王之春更加聲名狼藉，已爲世人所不齒了。

王之春一生著述甚富，除上面提到的幾種之外，尚有《椒生詩草》、《椒生續草》、《椒生隨筆》、《船山公年譜》等，其中最重要的應說是《清朝柔遠記》一書。

二

前面已經提到，《清朝柔遠記》的初稿約編成於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前後。關於這一點，可以找出不少的證據。例如《椒生詩草》卷四所刊光緒五年王之春的“幕中周篆雲茂才九日感賦元韻”詩裏曾寫道：“磨光輪鐵走天涯，慙媿謀猷說孔嘉。殺兔漫題梁苑冊，犯牛欲泛漢廷槎。”後面兩句之下分別自註：“編成《柔遠記》”和“將有日本之行”。同書卷五所刊光緒六年王濟夫贈王之春的詩裏也有“大著已傳修史筆”之句，並註明：“公著有《國朝柔遠記》及《談瀛錄》等書，採入史館。”再如《清朝柔遠記》諸刻本中皆載有王之春的自序，署明爲光緒六年仲夏撰，當是在該書初稿編成後所寫。從《清朝柔遠記》一書本身文字中考證，也不難得出相同的結論。如卷十九《蠡測卮言·聯與國》中曾寫道：“法人自八十年前拿破侖兼併各國，有囊括四海之勢，厥後一就禽於英，八年前其侄復就禽於德。”拿破侖在法國開始當政是一七九九年底，其侄拿破侖三世被俘發生於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之中，向後各推八十年和八年，正是光緒四、五年間（一八七八或七九年）。

本書初稿雖成於光緒五年前後，它的完整刻本却遲至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以後方才問世（最早的完整刻本是光緒十七年廣雅書局本）。在此之前，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廣州味古堂曾將王之春的《瀛海各國統考》和《蠡測卮言》十三篇刻印，書名亦稱《清朝柔遠記》，實際不過是該書附編的一個部分而已（同年廣東海墨樓和上海同文書局又據味古堂刻本石印發行）。至於《清朝柔遠記》的主要部分，即正編十八卷，光緒十七年以前始終不曾刊行。從光緒五年到光緒十七年，中隔十餘年，在此期間王之春對《清朝柔遠記》的初稿可能作過不少的修訂和增補。北京圖書館藏有《清朝柔遠記》的一種抄本，共十冊二十卷（第二十卷佚），篇目分卷皆與光緒十七年刻本同，但每卷條目却比刻本為少。而且抄本文字有不少墨筆修改之處，改後文字大致與刻本相同。顯然，這是光緒十七年刻本出現以前的一種抄本，甚至可能就是王之春本人的稿本（因筆者手頭無王之春手迹，難以印證）。無論它是稿本還是傳抄本，都可以說明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清朝柔遠記》一書，是王之春在光緒五年前後完成的初稿基礎上反復修訂和增補後刊行問世的。

三

本書共分二十卷，其中前十八卷為正編，是以編年體形式敘述清代順治元年（一六四四）至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二百多年間中外交涉的歷史，以及清朝同邊疆少數民族關係的若干史事；後兩卷為附編，包括《瀛海各國統考》、《蠡測卮言》、《沿海形勢略》、《環海全圖》、《沿海輿圖》、《三島（臺灣、澎湖、

瓊州)分圖》等。其中《蠡測卮言》又分爲十三篇，即：慎約議、聯與國、廣學校、精藝術、固邊圉、修船政、興礦利、防漏稅、強兵力、練民團、禁販奴、編教民、論鴉片。關於這部書的史學價值，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本書是十九世紀下半葉夏燮的《中西紀事》之後出現的又一部全面記述清代中外關係歷史的著作。與《中西紀事》相比較，《清朝柔遠記》既有一些與之相同的優點，又有自己的獨特之處。從相同方面看，二者皆係以清人敘清代史事，距離事件發生的時間不長（《中西紀事》定稿於同治四年，書中敘事訖於咸豐十年；《清朝柔遠記》初稿成於光緒五年前後，書中敘事訖於同治十三年），故見聞比較真確，具有顯明的時代性；而且，兩書作者都是具有一定愛國思想的留心時務之士，因此書中對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的侵略罪行、清朝封建統治者的腐敗無能和投降行徑都能有不同程度的揭露，而對於愛國官兵和廣大人民羣衆的反侵略鬥爭，也都有所反映和贊揚。從不同之處看，夏書採用紀事本末體，側重於若干重大歷史事件（如兩次鴉片戰爭）的記述，而王書則採用編年體，不僅給人更强的時間概念，而且內容也要全面得多。如果說夏書是以具有開拓性、內容翔實而著稱的話，那末王書就以條目清晰、知識廣博、文字精練見長。正因為如此，後者在相當長時間內一直被視爲了解和研究清代中外關係史必讀的書籍之一。

(二)本書取材比較豐富，據王之春自己講，書中史實除彙輯有關上諭及頒發的官書之外，“並搜錄當時諸臣奏疏，與名臣撰述、西人圖誌及各家私著可採掇者，薈萃而成。間有得之

聞見者，要必採訪確實，不敢稍涉虛誣”(《清朝柔遠記·凡例》)這些史實資料，雖然有不少後來因第一手材料(特別是清代檔案)的陸續刊佈降低了價值，但也有一些却因第一手材料的散失而成爲今日僅存的記錄，或者是與其它第二、第三手材料相互糾核的佐證。例如關於清初中外通商貿易的情況，關於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簽訂後桂良、花沙納在上海同英法美諸國公使商議通商善後事宜的細節，以及一八七四年日軍侵臺事件的詳細經過等，書中的記載至今仍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三)本書在記述中外關係歷史時，對所涉及到的世界各國，逐一介紹其地理、歷史概況及明清時期對這些國家的不同譯名和稱謂，這在當時中國仍處於半閉塞狀態的情況下，具有傳播世界知識的啟蒙作用。在今天，儘管這些啟蒙性的知識人們已無需從這一類的書籍中去獲得，但它却可以使我們了解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人的世界知識狀況及對世界的看法，也可以幫助我們弄清楚明清以來對外國地名、人名譯音上的不同和變化，對於開展中外關係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均有一定的意義。

(四)本書附編中的《瀛海各國統考》、《蠡測卮言》十三篇，是王之春洋務思想和外交主張的集中論述，其中不少觀點在當時具有積極的意義。例如王之春主張同外國修訂不平等條約、廢除外國在中國享受的片面最惠國待遇及領事裁判權，要求提高外國貨入口關稅、撤除釐金以“收我利權，富我商民”，呼籲加強邊防、興辦西學學校、開發礦利、禁絕鴉片等，在洋務運動中曾產生一定的影響。《瀛海各國統考》和《蠡測卮言》十

三篇也因此曾多次單獨刊行，或收入當時的“時務新書”之內。今天，它們仍是研究洋務派人士外交思想的有用資料。

當然，作為一部清人編寫的中外關係史著作，本書也存在不少缺陷。從資料方面來說，本書利用第二、第三手的材料較多，但對這些材料缺乏細緻的考訂，造成一些以訛傳訛的情況。如《明史·佛郎機傳》記載葡萄牙人來華事，後之讀史者以佛郎機音似法蘭西，遂以法蘭西目之，本書亦沿襲了這一錯誤；魏源《海國圖志》錯將麥加湖（今蘇聯貝加爾湖）認作呼倫貝爾泊，《聖武記·俄羅斯盟聘記》述《中俄尼布楚條約》內容諸多謬誤，時人何秋濤曾一一訂正之（見《朔方備乘》卷五十二“考訂《俄羅斯盟聘記》”、卷五十三“考訂《海國圖志》”），而本書却照錄魏源的錯誤說法未改，不能不說是很大的疏漏。類似這種考訂不精的情況，書中還有多處，請讀者與其他著作和史料對照，注意鑒正，這裏就不一一列舉。在思想觀點方面，本書雖不乏愛國之忱和開明之論，但總的來說，仍未能脫出封建主義的思想體系，陳腐的華夷之辨和名教觀念時有流露，對封建統治階級的愚昧無知和軟弱無能，也有辯解美化之處（如對恭親王奕訢與英法美俄簽訂《北京條約》的辯解等）。另外，本書站在清王朝立場上談論“柔遠”，反映了腐敗的封建統治階級愚昧無知和盲目自大的心理；本書在內容和體例上也未能將國內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同外國區別開來，很多地方說的都是國內少數民族，這都是較大的缺陷。

本書雖然有上述不足之處，但是它作為距今一百餘年前完成的一部中外關係史著作，畢竟是瑕不掩瑜。因此，本書自十九世紀末刊行之後，很受社會歡迎，曾一再翻刻翻印，廣泛

流傳。今天，它對於清代中外關係史的學習者和研究者來說，仍不失爲一本有用的參考書。

四

《清朝柔遠記》的刻本，主要有光緒十七年廣雅書局本和光緒二十二年湖北書局重刊本兩種（光緒十一年廣州味古堂刻本《國朝柔遠記》，因未包括本書的主要部分，故不計算在內）。這兩種刻本皆係王之春手訂，前者是王署理廣東布政使時刻印，後者則是王在湖北布政使任上所刊。二者文字基本相同，二十二年本僅對十七年本的個別文字訛漏作了補正，抽換了十七年本裏的《環海全圖》，代之以《地球圖》兩幅。除刻本之外，本書還有好幾種石印本，如光緒二十一年上海寶善書局本、光緒二十七年上海日新社本和同年上海申昌社本等。這些石印本皆係書商所爲，不僅印刷錯訛極多（甚至有將原刻本整頁漏印者），而且書名亦被擅改爲《國朝通商始末記》（或《中外通商始末記》、《各國通商始末記》、《通商始末記》），故其版本價值大大低於刻本。這次點校，是據光緒十七年廣雅書局本爲底本，校以北京圖書館所藏抄本和光緒二十二年湖北書局刻本，並參校了道咸同三朝《籌辦夷務始末》和《聖武記》、《中西紀事》、《朔方備乘》等書。除了訂正訛誤外，對光緒十七年刻本中原缺的“西洋教化王遣使入貢”等五條文字，今據抄本和光緒二十二年刻本予以補入。原書中還有一些清代的避諱字，如曆、丘、玄改作歷、邱、元等，則逕改回原字，不再出校記。爲了便於閱讀，書中各條陰曆紀年之下加註了公元。原書中雙行夾註，現均改排單行加括號。此外，還編製了《人名

索引》和《域外地名今釋》兩個附錄，以利檢閱。由於點校者水平所限，錯訛之處恐不能免，敬希讀者指正。

趙春晨 一九八五年三月

彭 敘

《柔遠》一書，臣友王之春所輯也。之春以文人兼武事，馳驅江海間，防北塘，駐京口，遊歷日本長崎、橫濱，於中外交涉事見聞周洽，暇則博稽國朝掌故，凡有關於遠畧者，提綱摘要，殫歲月之功，成爲是書，誠撫遠之宏圖，綏遠之良策也！

夫秦漢而還，多事四夷，往往兵連禍結，爲累世隱憂。卽勒石燕然山，繫單于頸致闕下，而財窮力竭，得其土不可治，得其人不可臣，隋珠彈雀之誚，所難免焉。至若兩晉、南宋已事，率皆君臣玩泄，養癰貽患，自小其朝廷，史冊所書，千載下讀之，猶令人髮指，其罪烏可貸哉？昔宣聖與魯君論文武之政，於遠人則曰“柔”。誠以遠人不可遽怵之以威也，遽怵之以威，則彼必震動不安；又不可故示之以弱也，故示之以弱，則彼必狡焉思逞。此而求一至善不易之經，則非“柔”不爲功。且夫“柔”之云者，非我之自處於柔也，道在順其歸附之心，而孚之以誠信，則柔者益柔，所謂“變友柔克”也。化其獷悍桀黠之習，而迪之以中庸，則不柔者亦柔，所謂“高明柔克”也。今觀所編，穆然仰見列祖神宗聲教四訖，廣乾坤覆載之恩，宏遐邇一體之量，揚丕冒之仁於罔外，消反側之萌於無形，用能梯山航海，視遠如歸，腹詠心歌，無遠弗屆。雖其間或剿或撫、或戰或和，不必盡歸一致，而變通盡利，要皆範躍冶之金，淘汰之以

適於用，閑出林之虎，馴伏之以安其常。蓋自文、武以後，柔遠之政未有若是之盡美盡善，可以行久遠而無弊者。

臣奉命巡視長江，兼閱海防，屢欲彙纂我朝懷柔遠人之謨，宣布皇仁於中外，且舉數百年來先後任事諸公成敗得失之數，藉資法戒，期於臨事而不惑。而簡練務煩，苦無暇晷。此書實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故序以行之。之春年甫強仕，喜著書，皆切於時務。異日才猷愈老，識見愈深，文章經濟當更有進於今茲者，則是書特其嚆矢耳。

光緒八年仲春上浣，臣彭玉麟謹撰。

譚 敘

嘗謂“惟聖知幾，亦惟聖因天”。天之欲合四海爲一家也，幾早見於康乾之世。幾見而先覺者，我聖祖仁皇帝、高宗純皇帝也。因天而弗違者，我文宗顯皇帝也。康熙三十三年，俄羅斯遣使來朝，上諭：“外藩朝貢，固屬盛事，總當以牧寧中國、培養元氣爲根本。”乾隆四十一年，刑部奏駁李質穎讞英商獄，不得其平，傳旨申飭，反覆數百言。兩聖人燭微洞遠，若皆逆知後世之有洋務者，非知幾其神乎？道咸間海氛亟矣，文宗顯皇帝獨決大計，社稷轉危爲安，得以全力蕩平髮、捻，而海外各國亦化干戈爲玉帛，非因天弗違乎？士大夫生當其世，出顛隲，享承平，上下數千年，縱橫九萬里，胸中不能無感慨。有感慨，斯有論列，有發明。此《柔遠記》之所由作耳。

《記》凡二十卷，編年繫月，採輯至當，將使讀者於通商大局知其所原起，知其所滋蔓，並知其所究竟，甚盛心也。雖然，事之原起當所聞世，事之滋蔓當所見世，而事之究竟則尚在未來。吉凶悔吝，變動不居，至可喜亦至可懼。懼將奈何？心列祖列宗之心而已矣。心列祖列宗之心奈何？自治其內而已矣。十數年前人事之杌隲，既以因天心而挽回，數十年後天心之福禍，又將因人事而旋轉，理固有可必者。《記》有之：“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在古人原非託諸空言，